

汉英语言思维



何南林 著

模式对比研究

齊魯書社

汉英语言思维

何南林 著

模式对比研究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英语言思维模式对比研究/何南林著. —济南: 齐鲁书社, 2008. 10

ISBN 978-7-5333-2112-3

I. 汉… II. 何… III. 语言—关系—思维—对比研究—汉语、英语 IV. H1 H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1695 号

汉英语言思维模式对比研究

何南林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21.75
插 页	2
字 数	715 千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112-3
定 价	48.00 元

序

早在南林出版他的《横行的英文》时，我就答应要给他写一篇序，后来因为抽不出时间而未果。这次我说一定要给他写，不料一拖又是一个多月，希望还能赶得上出版。

我与南林以前并不相识，甚至迄今没有见过面，我们是因为讨论一些共同感兴趣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而结识的。为什么我会这么热切地为一位素未谋面的朋友的新书写序呢？因为我认为南林的这部书是中国百多年来未曾有过之书，也是今日所不可无之书。在当今学术界如此呼吁“原创性”而“原创性”又如此薄弱之时，这是一部立意新、角度新、能给人启迪、能发人深思的书。

这本书无疑有许多“不足”，很容易招人指摘。首先，它不是一部艰涩难读的高头讲章，没有一般“学术”著作那种正儿八经的“学术”味，更没有现在流行的那种故作高深、故弄玄虚的腔调，全书找不到什么公式、符号，有的只是浅白的语言，读来几乎不要花什么力气；其次，它也不像“严肃”的科学研究，缺乏那种缜密、细致、“一二三四”式的论证过程，而是嬉笑怒骂、挥洒随意，与其说是论文，不如说像学术随笔；而第三，作为一本“随笔”性的著作，本书的篇幅似乎又太大了一点，七十多万字读起来毕竟需要很大的耐心，而造成这么大篇幅的原因主要是近乎无节制的大段大段的引用，这似乎也会使某些人读来不舒服。

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愿意向社会各界特别是语文学术界推荐这本书，包括英语界、汉语界、理论语言学界、翻译界以及语言教育界。这是什么原因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前面说的，这是一部“百年所未有、今日不可无”之书。有人可能要跳出来愤愤不平了：何南林何许人也？这么个“名不见经传”甚至有点“离经叛道”的“小人物”，居然能写

出“百年所未有”之书，将置我们这么多语言文字学专家于何地？但是且慢，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事实，自清末马建忠以来，甚至上推到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出版了这么多语言学著作、汉语研究著作、汉语和外语的比较研究著作，但我们所看到的几乎是一面倒地批汉语、夸外语，对英语更是尊崇得五体投地，几曾看到过一部以夸汉语、嘲英语，特别是以后者为宗旨的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专著？这难道算不上是“百年所未有”之书吗？在当今社会，有多少人狂热地追捧英语、弃汉语如敝屣，甚至恨不得生在异国、化身洋人，又看到过几本客观地指出洋文之不足、中文之价值，而让人头脑清醒的著作？这不是“今日不可无”之书吗？诚然，如本书这样专跟流行风潮、流行理论唱对台戏，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是否合适是可以讨论的，但其勇气是值得嘉许的，其背后所透露的真正的语言平等观更是最符合普通语言学精神的。我们总不能像书中所提到的某些人那样，认为只有骂汉语、批汉语、改造汉语汉字，才是革命，才是科学，才是进步；帮汉语说话，就是守旧，就是落后，就是“伪科学”；而敢于指责英语不如汉语、洋文不如中文，就更是大逆不道吧？中西优劣和华洋高下，也许值得辩，也许根本不值得辩，但要真正对之有所了解，总得听一听“两造”的说法，把双方的观点都听清楚吧？不能只许一家批评指责，却不许另一家反批评、反指责。如果说一百多年来我们所听到的都是贬汉语、夸西文的一面之词，那么看看南林这部书，也许我们可以了解一些“贬西文”、夸汉语的“另一面”之词，也许更容易达到一个公允的认识。

至于本书的写法，特别是嬉笑怒骂，甚至冷嘲热讽、讥刺挖苦的笔法，似乎太随便、太不厚道，有失“温柔敦厚”之旨，也太不像学术著作，也许有人觉得看不惯，我也想替作者辩护几句。我认为，这是被逼出来的。贬汉语、夸洋文，已有了相当长的历史背景和“语言学”背景。清末以来，在中国横遭列强欺凌之际，一批志士仁人怀着救国救民之心，起而寻求革新自强之路，这是令人敬佩的。但一些人由于历史和认识上的局限，却错误地把一股怒气、怨气都撒在老祖宗头上。一时间，否定传统、否定中国文化，进而否定中国文字、中国语言，都成了时尚。而19世纪以来建立在印欧语基础上的西方语言学一直把汉语汉字看做“原始”、“落后”的典

型,也仿佛从“科学”、“理论”上为这种主张提供了最好的旁证。因而一百多年以来,汉语汉字只有挨骂的份儿,仿佛成了中国落后的渊藪,挨打的替罪羊。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无论如何辱骂汉字、贬低汉语都是正常的,如何激烈的言辞都不过分,都“可以理解”;而相反的声音却不能容忍,都要被指责为违背语言学“常识”而加以痛斥,仿佛不如此就对不起语言学家的“良心”。强大的压力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引起反弹。特别是,如果考虑到从“五四”前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具体历史背景,我们对前人的一些过激言论还多少能够予以理解的话,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外交流大大发展、中华民族正在重新崛起,而语言文字科学的昌明也已达到新的高度的今天,看到有人仍然用一个世纪前的腔调来贬低、诬蔑甚至谩骂、嘲笑汉民族语文,那会激起人们的强烈反感,也是很自然的事。本书的一个可贵之处是引用了不少这类言论,如果不是指明出处的话,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是出于当代人之口。看到这类言论,我想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感到义愤填膺,本书作者不过是做出了一个正常的中国人应有的反应而已,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在这些嬉笑怒骂的文字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拳拳爱国之心和对祖国、对民族的忠诚,这是那些貌似公允、口口声声“科学无国界”的人所难以理解的。

本书作者是一位英语教师,这使我尤其觉得难能可贵。有一件事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一个多世纪特别是近半个多世纪来,骂汉字、贬汉语、吹捧洋文洋语的往往不是外国人,也不是国内的外语学者,而大多是汉语学者自己,其中许多人的外语水平并不高明甚至可说是基本不通,但指责起中文来却义无反顾,似乎十分理直气壮。另一方面,国内真正在搞外语的人固然很少像汉语学者那样以指责汉语为己任,却也不会指责外语,通常是保持沉默,或者置身事外。像本书作者那样一边教英语,一边指责英语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即使在外语教学界,也确实像一个“另类”。但我倒是非常佩服这样的“另类”。因为人们之所以不敢批评某件事物,除了礼貌等原因之外,往往是因为知之不深,怕说出外行话来遭人嗤笑。反过来,如果有人敢于批评某件事,那就说明他对那件事物相当了解,对说出的话有相当的把握。本书作者敢于在一片“崇英贬汉”的氛围中批评

英语,除了勇气之外,还说明了他对汉语和英语了解的自信。我认为,这对于一位外语学习和研究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曾经有人指出过,在当今弥漫全国的英语热中,真正学好英语、能够达到自由运用程度的大约不足百分之五,其余绝大多数不过是在低水平上徘徊重复。多数学外语的人对外语敬畏之唯恐不及,这当然是需要的,但另一方面是否也反映了他们对所学的对象知之不深?能够像南林那样系统地指出英语之不足,那没有对英语的精湛的了解是做不到的。就这点看,南林的书对于广大英语教师和学习者来说也不无启示。

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我虽然不遗余力地推荐这本书,并不说明我同意这本书里所说的每一句话。前面我说过,中西优劣和华洋高下,也许值得辩,也许根本不值得辩。世界上的语言、文化都是平等的,对于本民族来说更是宝贵的财产、心灵的家园。我们研究、了解、比较语言和文化间的差异,不是为了比出个高下,扬此抑彼,更不是为了以这一个取代另一个,而是为了加强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了解,更好地促进全世界各国人民间的和平相处,更好地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南林的这本书只是一个负责任的学者对一个世纪来“崇英贬汉”论的一个本能的反弹,从另一方面摆出一些很多人所不曾注意到的事实,促使人们进行更全面的思考。他并不想由此而推出一个相反的“崇汉贬英”论。我相信这一定是他的本意。

是为序。

潘文国

2008年2月23日于华东师范大学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绪 言	1
第二章 语言与思维	6
第一节 沃尔夫假说	6
第二节 汉语与思维	16
第三节 英语与思维	21
第三章 语言与逻辑	57
第一节 外行与专家	61
第二节 逻辑与习语	79
第三节 语序与时序	89
第四节 精密与模糊	107
第四章 原始思维与文明思维	142
第一节 原逻辑思维的运算和方法	144
第二节 从原始人的思维与他们的语言看原始人 的思维	148
第三节 从原始思维与计数的关系看原逻辑思维	176
第五章 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183
第一节 汉字与抽象思维	185
第二节 分类与命名	195

第三节	汉语与反事实推理	206
第四节	“眼睛”与“eye”	215
第五节	抽象名词与伪学术	224
第六节	汉语的“险境”与“救赎”	235
第六章	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	247
第一节	高语境与低语境	250
第二节	听者负责与说者负责	269
第三节	意合与形合	288
第七章	整体思维与个体思维	321
第一节	焦点与散点	326
第二节	化整与聚零	342
第三节	重复与替代	356
第四节	造字与构词	372
第八章	跨越思维与演算思维	387
第一节	视角与转换	393
第二节	空白与省略	407
第三节	日常语言与形式语言	419
第四节	衔接与连贯	434
第九章	主体思维与客体思维	450
第一节	人称句与物称句	454
第二节	主动句与被动句	464
第三节	无主句与完整句	476
第四节	话题句与主谓句	491
第十章	归纳思维与演绎思维	506
第一节	直线式与螺旋式	510

第二节	前因后果与前果后因	523
第三节	从大到小与从小到大	533
第四节	土八股与洋八股	544
第十一章	骈偶思维与散行思维	555
第一节	骈偶与 parallelism	557
第二节	对对子与思想条理	569
第三节	并列与主从	581
第四节	骈偶与数学	590
第五节	骈偶与语文	600
第十二章	动态思维与静态思维	614
第一节	动词优势与名词优势	615
第二节	动作句与状态句	626
第三节	动态动词与静态动词	636
第四节	灵活与僵硬	650
第五节	作画与造句	664
参考资料		676

第一章 绪 言

2003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了 William Hannas 的专著:“The Writing on the Wall: How Asian Orthography Curbs Creativity”。

首先来看何谓“writing on the wall”。

这是一个来自旧约圣经的典故,说的是在伯沙撒王的宴会上,有人突然发现一只手指在墙上写字,但既看不见写字的人,也读不懂写出的字是什么意思。惊恐之中,请来犹太俘虏但以理,才得以破解,即:“MENE 就是上帝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TEKEL 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UPHARSIN 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与玛代人和波斯人。”

钱歌川先生介绍完该典故的来历后,总结道:“由此可知,the writing on the wall 是亡国的征兆。”(1976b;225)

Hannas 把“亡国征兆”与“亚洲语言的书写”联系在一起,其用意当不言而喻,无须多说。

伍铁平教授解释道:“通读过 W. Hannas 该书的莫大伟博士告诉我,作者用 writing on the wall 这一成语,这是借用双关,说明该书同文字有关,绝非诅咒亚洲文字为‘不祥之兆’。”(本书编写组 2004:453)(注:伍教授将该书名译为《不祥之兆:亚洲语言的书写如何抑制创造性》)

然而,试问读者,您不觉得这种“圆场”打得有点近乎于“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退一步,就算作者的的确确不是存心想要“诅咒”亚洲文字,那他何苦要借用如此“恶毒”的双关呢?常言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循循善诱难道不比劈头盖脸更为有效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早在 1997 年 Hannas 还出过一本书:“Asia's Orthographic Dilemma”(《亚洲的书写困境》)。我们不妨斗胆猜测:大概是随后的研究,使他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亚洲语言书写的危害性,同时却又痛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于是,“愤怒出诗人”,为了将全体亚洲人民从“书写困境”中解救出来,为了让全体亚洲

人民能够充分自由地发挥“创造性”，这才不惜“骇人听闻”，以“亡国”为警示，要的就是“醍醐灌顶、棒喝猛醒”的效果。

作者虽然只是笼统地言及“亚洲语言的书写”，但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出，他实际上指的就是方块汉字。这种严重违反“语言发展客观规律”的象形文字，长期以来，一直是“主流语言学”的一块心病，一直是学术圣殿上的一个“异数”，就因为方块汉字的存在，致使许多“语言学 ABC”无法成立，因此必欲除之而后快。

然而，汉字真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吗？

姚小平先生在评论洪堡特时指出，对于今天探讨汉字问题的语言学者，他的两个说法仍有参考价值：

第一，文字应语言的内在需要而生，一经生成，又与语言结构、思维活动密切关联。由此看来，汉字就是汉语的内在组成部分，其功用不可能为任何外在（外来）的文字形式所取代。

第二，象形—表意文字有可能成为“一种特别的语言”。汉字有象形、表意的成分。使用统一的汉字，人们的交际可以超越方言（汉语的有些方言在许多西方学者眼里是不同的语言）的界限，由此看来，汉字确实可以说是一种具有特殊作用的（书面）语言。每个汉字除了表示词义外，本身又有形义。一组语义相关的汉字，其形义往往相通，构成了一个“形认场”（比如表达织物的词多带“纟”旁）；形义场与语义场（词场）有可能基本重合，也可能部分重合。所有的语言都有语义场，但只有汉语才有第二语义场——形义场。近年来兴起的汉字文化研究，其内容之一就是対形义场的分析和溯源。作为一种具有超方言的交际功用和独立的语义系统的特殊语言，汉字是有碍于还是有利于思维呢？拼音文字与汉字孰优孰劣呢？这些问题如今自有热心者在进行讨论，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说了。（1995:103）

所谓“汉字不可能为任何外在（外来）的文字形式所取代”，显然就是针对“取代”之举而来的，因此也就不妨视为对“汉字拼音化”的间接否定。理由很简单：既然“文字应语言的内在需要而生”，那么，汉字之生显然也是顺应了汉语之内在需要，因而与其语言结构、思维活动密切关联。然而，遗憾的是，对于“汉字是有碍于还是有利于思维”这样一个意义极其重大甚至可以说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姚先生却以“自有热心者在”而轻轻回避了，令热心者深感失望。当然，“这里”的不多说或许正是为了“那里”的全面阐述、系统发挥。笔者孤陋寡闻，望知者见教。

笔者自认也是一个“热心者”，很想就姚先生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做一点相关甚至深入的探讨,即不但回答“汉字是有碍于还是有利于思维”,甚至更要进一步追问:“英语是有碍于还是有利于思维?”

有学者立刻就要提出质疑:一为汉“字”,一为英“语”,前者属于文字,后者属于语言,把如此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领域扯到一块,简直是懂语言学 ABC!

当然,要想不懂装懂,以次充好,那也不难,只要把后一句改为“英字是有碍于还是有利于思维”即可。只是暗自担心,这种说法是否更要让人笑掉大牙?

正因为世间不存在“英字”、“法字”、“德字”、“俄字”,于是,“汉字与思维”遂成“独门绝学”。换句话说,只有换为“汉语与思维”,才能形成对比,横向研究,例如“英语与思维”、“法语与思维”等等,才能一并纳入“语言与思维”的大题目之下。

问题在于,讨论英语,可以撇开“英字”;讨论汉语,离得开“汉字”吗?

笔者左右为难,只好寄希望于读者不懂语言学,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懂西方语言学,懒得区分语言与文字,以便“蒙混过关”。好在不懂(西方)语言学 ABC 的人多得很,更好在即使精通(西方)语言学 ABC 但一不小心又违背(西方)语言学 ABC 的人也不少。例如,上引姚先生这一段,便多次或是直接或是间接说到“汉字是一种(特殊)语言”。

若再要穷根究底的话,甚至还可以“牵连”到索绪尔:“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但是这种代替因为可能是绝对的,所以不致象在我们文字里那样引起令人烦恼的后果。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2005:51)

潘文国先生评论道:“这段话几乎从没引起过中外语言学界的重视。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他所说的‘文字是符号的符号’之类的话,而且把他对西方拼音文字的这个看法不加区别地加到汉语和汉字头上。对于这种‘有选择地引进’的做法和由此产生的‘理论’,实在值得人们在汉外对比的过程中进行深思。”(2006:130)

下面再来引用几家批评:

过去,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著,也就没有系统的语法理论,所有的理论都是外来的。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这不是坏事,问

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吕叔湘)

……有一些语言学者企图摆脱印欧语的束缚,探索汉语自身的语法规律。尽管他们做了不少有价值的工作,但仍然难以消除长期以来印欧语法观念带来的消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用印欧语的眼光来看汉语,把印欧语所有而汉语所无的东西强加给汉语。(朱德熙)

回过头来看汉语研究时,常觉得汉语学界太迁就欧美语言学理论。欧美理论中有许多不适用于汉语处,显然是由于欧美学者缺乏汉语知识而残留的,就像他们当年尚未认识欧洲现代语言时也曾带着拉丁语的成见看自己的语言一样。但中国语言学界都没有与他们较真。(程雨民)

所谓“死套”,即用英语的语言文化概念或者语法模式套汉语,套不进也要套,套不全也要套,套不舒服也要套。(钱冠连)(潘文国 2006:165~167)

简言之,东方与西方,其语言学各有各的“ABC”。然而,长期以来,我国语言学界仅仅只对后者顶礼膜拜,奉为圭臬。季羨林先生批评道:

有个别的学者患了明显的“贾桂病”,总觉得自己这也不是,那也不行,在“老外”面前挺不起腰板来。一提到中国的语言理论,他们的鼻子都要笑歪。大部分搞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的学者,他们那一套分析的方法,我总觉得是受了西方的影响。这影响自《马氏文通》以来就存在于我们的汉语研究中。最近几年,我才豁然顿悟,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同中国的汉语不是一码事。西方的基本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而东方的,其中当然包括中国的基本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表现在语言上,就形成了西方与中国的语言的差异,在中国首先是汉语。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决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明白的。简而言之,最明显的差别就是西方印欧语言有形态变化,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尽量用语法变化的形式来表达得尽可能地清楚。而汉文则既无形态变化,词类的区分又往往并不泾渭分明,总之是有点模糊。汉语的模糊性,多少年来就受到了谴责。有人说——是不是鲁迅先生?——中国人语言模糊就说明思想糊涂。鲁迅先生等人,曾企图改造汉语,有一段时期使用“的”、“地”、“底”三个字,把英文 historically 译为“历史底地”,一时成为严肃的笑话。从世界最新科学的发展来看,万事万物没有哪一个是绝对清楚的。汉语的优点正在于它的模糊。用西方语言的理论来硬套是不行的。也只有这样才能

真正创立自己的理论。有人把中国学者没有发出声音称为“失语症”。找准了病源,开个药方,并不是办不到的事情。(2002:7)

许国璋先生同样毫不客气:

有中国语言学大师某人,问他“中国有没有语言学?”他说“少。”他又认为“中国的古人错误地把文字当语言”。中国古代的学者给我们留下了很丰富的语言学遗产,有待我们去发掘,作茧自缚,何苦?(1991:92)

遗憾的是,这类“严肃的笑话”、“作茧自缚”至今仍然不绝于耳,“汉字是有碍于还是有利于思维”便堪称典型代表。正因为如此,本书也就绝非普普通通、就事论事的“对比”之作。既然一开始就在前言中涉及了“亚洲语言的书写如何抑制创造性”这样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以及“汉字是有碍于还是有利于思维”这种本身就有重大问题的“伪问题”,也就不得不拿出相当大的篇幅对许多类似的论点进行严厉批驳,其中不乏激烈言辞甚至辛辣讽刺,如果唐突学术的话,敬希读者原谅。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大量的语言材料揭示西方语言是“如何抑制创造性”的,如果难免“民族主义”、“沙文主义”之嫌的话,更希读者谅解。

笔者当然不敢夸口已然找准病源,开好药方,但自信身染“贾桂病”的患者,读完本书以后,至少能将腰板挺直一点。(注:贾桂为京剧《法门寺》中的人物,明武宗时宦官刘瑾手下的一个小太监。一次,刘瑾让他坐下说话,他不肯,说是“奴才站惯了不想坐”。后专指缺乏自尊甚至奴性十足的人。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写道:“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 □

第二章 语言与思维

Nilsen 在论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时写道:“Does culture shape language? Or does language shape culture? This is as difficult a question as the old puzzler of which came first, the chicken or the egg, because there's no clear separ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到底是文化决定语言,还是语言决定文化,这个问题就有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古老谜语一样,难以破解,因为语言与文化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1987:324)

笔者拟将这一比喻引入思维与语言的讨论之中。其原因,首先当然是才疏学浅,不足以涉及如此重大的哲学命题。其次,则的确是认为难以破解。换句话说,无论是“思维决定语言”还是“语言决定思维”,恐怕都很难拿出完全让对方心服口服、不予争辩的铁证。根本原因就在于——语言与思维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

Nilsen 不去争论文化与语言何者为先,而主要关注另一个问题:“一个广为流行的语言定律是:语言随着文化的改变而改变。而反过来的另一种说法却不易为人接受,即:文化随着语言的改变而改变。”她举的例子是:女权运动者试图用 Ms. 取代 Mrs. 与 Miss, 以及寻找一些两性共用词来取代 chairman, mankind, brotherhood, freshman 等阳性名词,而一些语言学家却对此含笑不语,甚至冷嘲热讽。

同样,“思维决定语言”的观念可谓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而“语言决定思维”则似乎有违常情,难以置信,因此也就成为我们关注的主要对象。

第一节 沃尔夫假说

美国化学工程师本杰明·沃尔夫曾供职于一家火灾保险公司,在对上百起火灾事故进行调查分析时,发现起火的原因并不仅止于线路损坏、通道狭窄等客观因素,有些可以说完全是由于语言的误导而引起的,其中一个最著名的例子便是“空汽油桶”。

通常在汽油桶周围,人们都会小心谨慎,避免火烛。然而,若是一个空汽油桶,则往往无所顾忌,随便吸烟甚至乱扔烟蒂。这是因为在人们心目中,“empty”常常意味着“不存在、空虚、否定、无生命”等,却根本没有想到,空汽油桶因含有气体、残液等,反而更容易引起爆炸,因此也就更加危险。

沃尔夫将这种现象归纳为“误导行为的情境命名”,他总结道:“类似的火灾事例不胜枚举。它们足以让我们看到语言形式的类推是如何为行为做出引导性提示的:语言形式为情境套上某个定义,并由此做出某种程度的分析、归类,将它分配在一种世界格局中,而这一世界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建立在一个社团语言习惯基础上的’。我们总是以为我们社会的语言分析忠实反映了现实,事实上并非如此。”(2001:122)

这就是有名的“沃尔夫假说”,或者叫“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斯图尔特·蔡斯将其归纳为两个重要的假设:

第一,所有较高层次的思维都依赖于语言。

第二,人们习惯使用的语言的结构影响人们理解周围环境的方式。宇宙的图像随着语言的不同而不同。(2001:2)

简言之,也即“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论”。

严格说来,沃尔夫假说其实并非起自沃尔夫,在他之前早已有人论及过类似的问题。例如:

人们以为他们的理性支配词语;其实,同样真实的是词语反作用于理解。(培根)

每一个人,不管操什么语言,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特殊世界观的承担者。世界观本身的形成要通过语言这一手段才能实现……每种语言都会有各自的世界观。(洪堡特)

语言伸展多远,现实就伸展多远。(维特根斯坦)

我们说掌握语言,但是,实际上是人被语言所掌握。(瓦尔特布尔格)

沃尔夫自己提供的例子是:“牛顿如果说英语,就会得出迥然不同的逻辑。”他还经常引用弗尔茨·毛塞纳的话:“亚里士多德如果说的是汉语或达科他(Dakota)语,他的逻辑和范畴必然是另一个样子。”

我们下面就来看看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